

烙痕

· 阮文涛文集

苑耀升 编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烙痕

· 阮文涛文集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烙痕·阮文濤文集

著者：阮文濤

出版發行：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號

電話：六七〇六六三三

傳真：六七〇一三八一

印刷者：藝聯印刷廠

香港觀塘偉業街一〇三號十一字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數：二〇〇〇冊

定價：港幣四十六元

人民幣二十八元



二〇〇〇年四月初版·香港

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马少波先生为本书题字：文如其人 势若波涛

文如其人
势若波涛

公元两千零三年秋
马少波题

阮文海文集



愿你为真理而奋斗到最后
——赠文涛

屠岸

历尽坎坷、磨难与曲折，
二十年炼狱并不是噩梦：
中国为知识分子清醒着，
灰烬里迸涌出新的跃动！

大师的学生，受大师关爱，
为大师的平反昭雪而奔忙：
历史是一座悲喜剧舞台，
在台上你始终为理想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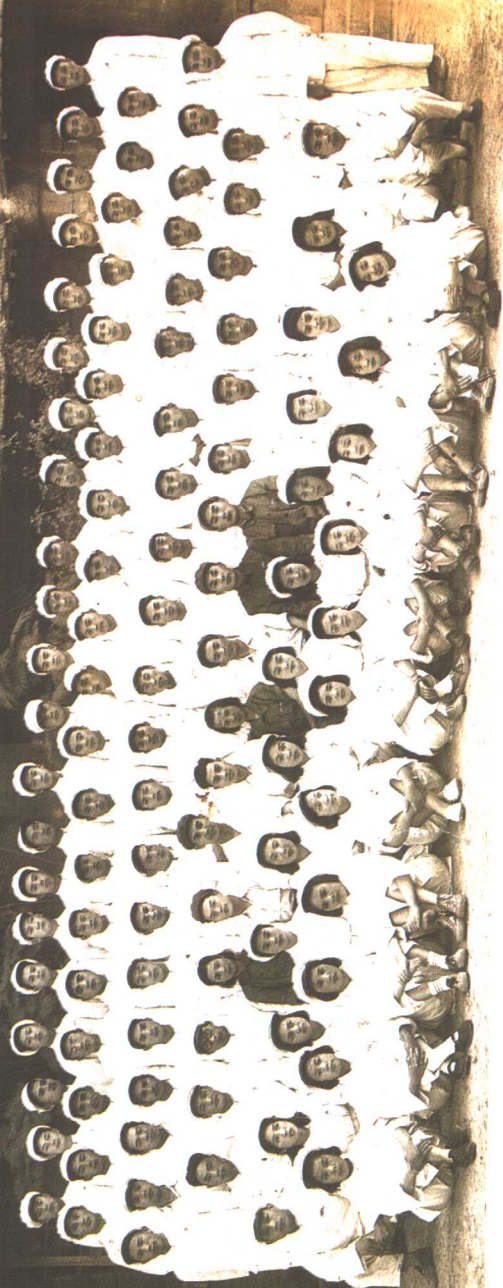
讲坛上面对莘莘学子，
教室里把学术气氛激活；
钻研与勤奋，忠诚与良知，
为探讨剧艺而笔耕不辍。

你曾为艺术不懈地追求，
愿你为真理而奋斗到最后！

2000年1月31日

華東大學文藝部全體合影
一九三〇年

於濟南



文清同學畢業紀念

西師

一九四四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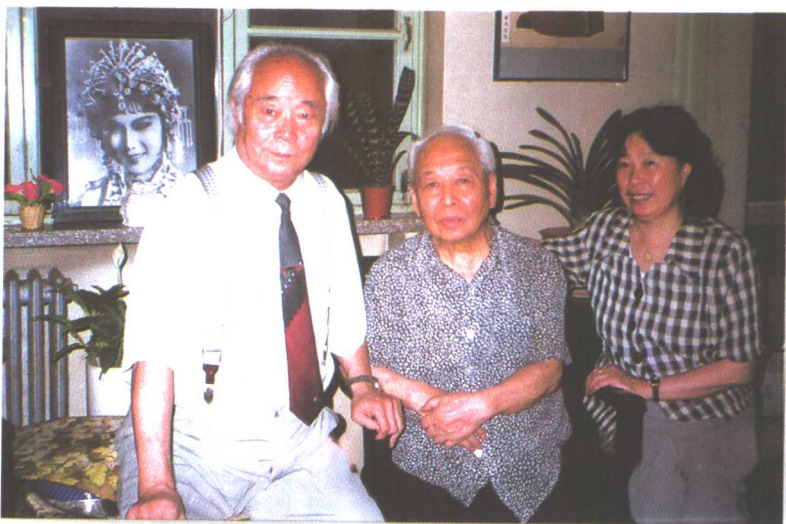
上海。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首届毕业生与院领导、教师合影(前左排六：院长熊佛西，左七赵铭彝教授，后排二左三阮文涛)



北京。阮文涛、钱学敏夫妇看望马少波先生、夫人李慧中同志(1998年6月) 王永刚摄



上海。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戏剧文学系师生合影（前排右起二、三为李健吾先生及其女儿，往左：张君川、魏照风、赵铭彝三位教授。右一是沈铭助教。后排是三个年级（班）学生，左五阮文涛



北京。阮文涛、钱学敏夫妇去看望吴祖光先生，在新凤霞同志遗像前留影(1998年6月26日) 王永刚摄



北京。阮文涛、钱学敏夫妇看望张颖同志(1998年6月23日)



北京。阮文涛、钱学敏夫妇看望屠岸先生、夫人章妙英同志
(1997年5月3日)



炼狱幸存者，左起：杜高、阮文涛、戴再民(1997年5月1日)
钱学敏摄影



在参加田汉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后，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钱学敏、田野、张辉、阮文涛（1998年6月20日）



济南。阮文涛、苑耀升在山东艺术学院门前合影（2000年3月6日）
钱学敏摄影

烙痕：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

——《烙痕·阮文涛文集》序（一）

杜 高

年轻一代的读者们从这本文集中读到的是作者的学识和见解，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和对人生意义的揭示。而我读到的却是一位备受摧残的朋友对艺术的痴迷和生命的顽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惊心动魄的历史内容的年代。上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年代里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煎熬，其中五十多万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和人生磨难。这只是一个“序幕”，到了六十年代末，爆发了更伟大的“革命”，这时，已不止是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全都陷入空前的灾难，整个中国沉没在一片黑暗和混乱中，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曙色才重现神州大地，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阮文涛兄和我，五十年代都还是不谙世故的天真烂漫的青年，却都不由自主地被推进了这个历史的大波涛大漩涡之中，翻卷漂浮，整整二十二年，既是历史的罹难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想，未来的历史学者们都会用探究的眼光来寻找上世纪五十年代历史悲剧的根源并揭开那个时代的秘密，文涛兄的这本文集将是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历史证据，他们会珍视这本文集的价值。它不仅仅让人们看到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苦难，更让人们感佩他在苦难中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

1958年4月18日，对于文涛兄和我都是永远难忘的日子。这

天早晨，我们先后走进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文联大楼三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让我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字，我们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负责人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时，从隔壁房间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一辆卡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自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以后，我们就与世隔绝，开始了赎罪生涯。同一天离开文联大楼的剧协罪行最严重的 5 个右派是：戴再民、唐湜、汪明、杜高和阮文涛。

戴再民是我们当中的年长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已有 20 多年党龄。他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出狱后又为营救狱中同志到处奔波，饱经政治风霜。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是以《戏剧报》记者的名义“煽动”艺人鸣放，“进行反党活动”。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劳教分子，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实在难以接受，他蹲在卡车里一言不发，垂着头，心情沉重。

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个勤奋的作家。这时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午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 40 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五个右派中个人命运最悲惨的是汪明。汪明和我是同案犯，我们都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的首要分子。汪明是一个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青年剧作家，他对共产党新社会充满了信任和热爱。汪明是个孤儿，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

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演剧活动。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如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里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着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剧。1950年冬，他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同我又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中度过战争的最艰苦的日子，我们曾一同在敌机的照明弹下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山洞里的烛光下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轰炸中为战士演戏。汪明从朝鲜回国后，创作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可爱的青年战士形象。这是当年表现朝鲜战争的一部最富有生活气息和诗情的剧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已经排演成熟，即将在北京公演。不料此时突然爆发胡风反革命事件，由于汪明和路翎的友谊，他被怀疑为与胡风集团有关联的人物。《第一次功勋》停止上演，汪明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汪明一直到受了劳动教养的处置，仍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满腔热爱，他没有颓丧的表情，对前途似乎仍很有信心。他在公安局里还悄悄对我说：“田汉同志前两天还同我谈话，要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关怀知识分子的，我们只要努力改造，很快就会回到革命队伍的。”汪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孤苦伶仃，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没有亲人。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几个月，悲惨地死在安徽一个劳改农场里，没有一个人人为他哭泣。他没有熬过最后的艰难日子，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堆泥土。1979年我平反后，诗人公刘从安徽写信告诉我汪明已离世的消息，他说，汪明死后只留下了一个日记本。

阮文涛是我们五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他解放前参加革命，建国后又是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他兴高采烈地分配到全国剧协的机关刊《戏剧报》当记者，能和田汉这样的大戏剧家一道工作，他感到无比的幸福，认为自己前程似锦。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

积极采访和组稿，反映戏剧工作者的呼声。7月，他刚刚和戏剧学院的一位女学生结婚，正陶醉在爱情里。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时闯下大祸，招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后果。阮文涛年轻力壮，他被收容教养后，情绪没有消沉，他相信只要积极劳动就能摘掉右派帽子。

我们五个人在看守所学习一个月以后，就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这以后，我们就分开了，一别20多年。一直到1979年春天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在北京重聚，大家都有一种“历尽劫波兄弟在”的喜悦，五个人中除了汪明已经去世，其余四人都活着回来，只是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年长者更加老迈了。老党员戴再民恢复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唐湜回到了温州老家，几乎每年都有新著出版，成为浙江最受敬重的老作家老诗人之一。阮文涛因为妻子和孩子们都在山东农村，一时难以调来北京，他决定放弃在北京工作回到济南，在山东艺术学院执教、编报。他虽已年过半百，但工作热情和艺术才华都不减当年，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勤奋写作。我从山东的报刊上经常看到他的戏剧评论，其论述立意新颖、见解独到。有的文章收入《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还有多篇文章获奖。我为他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敬佩。

我读过他悼念田汉先生的文章和赞美祖光凤霞夫妇的散文，深感他经过半生的磨难对人对事感情更深沉更真挚了。他评论文章我虽然读得不很多，但也感到他积累了几十年艺术的经验，眼界更开阔了，思想也更成熟了。有一次他寄了一篇《给游默的信》给我看，并附了四十多年前游默的大批判文章的复印件。我理解他的愤懑，但我还是劝慰他更平静地对待历史，不要苛求每个人都有反思和自责的心胸。尽管半生的苦难经历在我们的心里都留下了抹不掉的烙印，但这烙印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

2000年3月29日写于北京安外寓所

寻找历史的解释与生命的归宿

——《烙痕·阮文涛文集》序二

苑耀升

追求卓越的人往往离不开三类友人的相知相助。与和自己年龄相同的杰出者相交为友，必定能够深层次地激活自我的竞争本能进而有奋力前行的人生，此其一；其二，与小于自己的杰出者相交为友，必定能够全身心地增添自我的生命活力进而有朝气蓬勃的人生；其三，与长于自己年龄的杰出者相交为友，必定能够经验性提升自我的理想诉求进而有科学性的人生。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这样说过，也曾经这样做过。与阮文涛先生的交往便属于第三类。文涛先生既是我的学界前辈，又是与我知交十四年之久的友人。虽不敢说文涛先生必定是他那代人中的一位最杰出者，但说他是一位怀着朝气奋力前行而留下历史烙痕的人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作为文艺评论家、文艺编辑和文艺记者，他曾经在中国戏剧界辉煌过，而这种辉煌又是与他极富戏剧性的人生命运结构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走过一段特殊人生道路的具有典型性并颇有传奇色彩的爱国知识分子。

阮文涛是山东肥城人，生于1931年。他从少时起就接受了革命的进步思想并立志走革命的道路。1949年2月，他与许多爱国青年一道，踊跃加入革命队伍的行列。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使他的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他被那溢满激情的歌词深深的折服了，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著名的戏剧文学家——

从此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田汉的戏剧诗文，从此也成了他所钟爱的文本。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吸引并坚定了他从事革命文艺的志愿，很快，他便在华东大学文工团成为一名革命的文艺战士。不久，又先后被组织选送到山东大学艺术系和上海戏剧学院专攻戏剧文学，成为著名戏剧家李健吾教授的入室弟子。从文工团走向学府，使他在比较丰富的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又接受了严格的系统训练，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195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由田汉任主席的中国戏剧家协会，担任了全国唯一的权威性戏剧刊物《戏剧报》的编辑和记者，文涛先生从此走入文化学术界。五十年代中后期，适逢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戏曲戏剧剧目进京汇演的盛事，文涛先生作为《戏剧报》的编辑、记者兼文艺批评家，满怀热情地投身到采访和组织、编辑关于戏剧剧作和演出的大量新闻报道的工作之中去。

在担任《戏剧报》记者期间，对话剧《万水千山》、昆曲《十五贯》的演出，阮文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写稿、组稿和拍照，推动了这两出戏的宣传。在他写作了大量戏剧界新闻报道的同时，他还进行了探索戏剧艺术，尤其是关于现实主义艺术的美学规律的理论研究，并先后在《文汇报》、《戏剧报》、《北京日报》、《新民报》和《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戏剧评论文章。诸如《谈儿童剧〈祖国的园地〉》、《丑剧的美感》、《谈谈丑剧》、《山东戏曲会演观摩散记》、《谈京剧〈罗盛教〉》等等，对于戏剧艺术的传统与创新和戏剧艺术的美感特征作出了初步的探讨，给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剧作家表演家们以极大的鼓励。

前些年，戏剧界一方面大谈戏剧“危机”，同时又盛吹捧之风。阮文涛不仅做人心胸坦荡，其文风也不染世俗，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发表的四十多万字中，没有一件应景之作，这又是他的一大特色。

他这种人似乎注定是要倒霉的。1957年那场灾难便降临到这